

第五章

探讨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感与精神健康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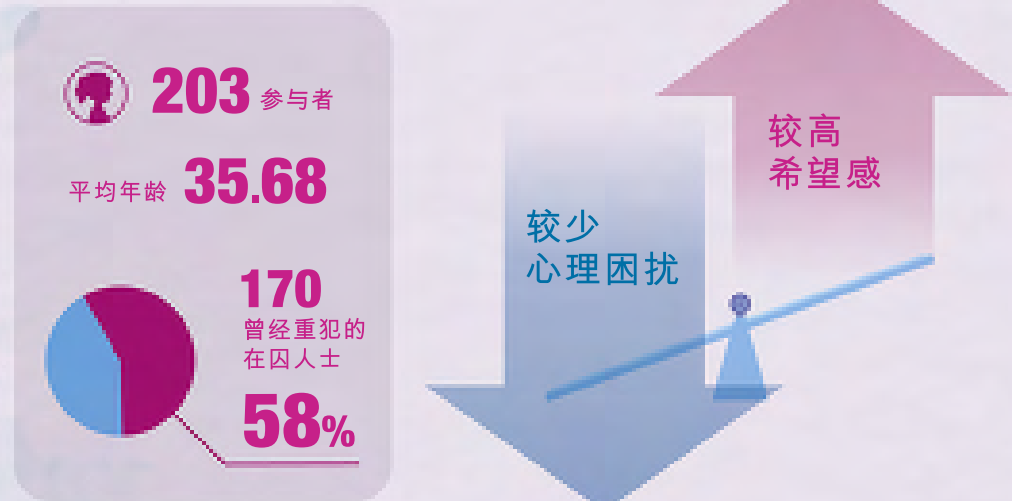
麦慧明博士¹、何敏贤教授²、李颖玲女士³、鲍家欣女士³

- ¹ 惩教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 ² 香港城市大学心理学教授
- ³ 惩教署临床心理学家

备注：本文在2020年于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刊登。是次重印已获批准。



结果：有203名女性在囚人士参与是次研究，年龄介乎21—67岁不等，平均年龄为35.68岁，超过一半为曾经重犯的在囚人士(170名，占58%)。整体而言，若她们有较高的希望感，其心理问题徵状亦会较轻微。正面注意偏向是与较高希望感及较少心理困扰有关联，相反，负面注意偏向则与较低希望感及较多心理困扰有关系。在统计模型所见，注意力偏向似乎是希望感与心理困扰两者关系之中的中介因素。



结论：是次对女性在囚人士的研究与过去针对非在囚人口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示，调整注意力方式的治疗乃值得研究，它帮助这弱势群体提高希望感和减少心理困扰徵状，甚至有助减少她们的伤害行为。

摘要

背景：过去的研究指出，有较高希望倾向认知的非在囚人士，其心理问题徵状会较少，并证明注意偏向在这两者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至于在囚人士的情况如何，则尚待探索。

目的：我们的研究旨在调查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倾向认知，与惯性注意力处理方式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我们假设女性在囚人士有较高度度的希望感，是与在周围环境中较多关注正面讯息及较少关注负面讯息有关，从而令她们出现抑郁、焦虑和压力徵状的程度有所降低。

方法：我们以横向研究的方法，招募被转介接受心理服务而自愿参与研究的女性在囚人士。参与者需独立完成一组自我评估量表，从而量度她们的希望感、对正面和负面讯息的关注程度，以及焦虑、压力和抑郁等徵状。

引言

监禁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创伤经历 (Elisha, Idisis, & Ronel, 2012; Levenson & Willis, 2019)。形成这种情况的环境因素包括：行动受限制、权威人士在场、空间有限、因保安考虑而导致减少隐私和提高警觉，这都可能增加创伤相关徵状和无望感的风险 (Miller & Najavits, 2012)。

Sykes (1958) 归纳出在囚人士因五类缺乏而引致的压力：(1) 商品及服务；(2) 自由；(3) 异性关系；(4) 自主权，和 (5) 安全感。他认为这些缺乏构成「在囚的痛苦」。在这些类别中，最常被提到的适应困难是与家人和朋友的分离 (Zamble & Porporino, 1988)。有指，女性在囚人士比男性在囚人士更容易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James & Glaze, 2006)。女性在囚人士较男性在囚人士更普遍出现抑郁、焦虑和自残行为 (Bloom et al., 2003)。针对女性在囚人士的研究指，她们与男性有不同的心理需要，部分原因与她们过去曾受到情感、身体和性方面的创伤有关，部分原因则来自她们的育儿责任所产生的压力 (LeClair, 1990)。此外，女性在囚人士的自杀率亦高于社区上其他可比拟的群组，这表明一般的在囚经历不但可能触发她们已存在的倾向，也有可能增加她们以自毁解决问题的机会 (McDermott, 1991)。因此，有必要确定影响女性在囚人士心理压力背后的相应保护及风险因素。

希望倾向认知

希望感是一种正向认知，它包含了三个元素：(1) 目标；(2) 目标策略路线的相关思考，以及(3) 意志力相关的思考，即达至目标的动力 (Snyder et al., 1991)。Snyder 的希望模型提出，人们的行为是由目标所导向，人亦因而起劲和坚持行动去达至目标。

Martin 和 Stermac (2010) 发现，在惩教院所中，当人的希望感水平越低，他们的重犯风险便越高；犯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不恰当的策略路线思考，以及缺乏意志力思考。如此，希望感可以被视为一个保护因素，以降低重犯风险；这可能促进更生人士取得支持和成功的机会，让他们朝著正面目标而努力 (Moulden & Marshall, 2005)。从癌症患者和残障人士的经验可见，保持希望认知的人会有较强的免疫力，和较少出现抑郁或焦虑 (Elliott et al., 1991; Ho et al., 2010; Yuen et al., 2014)。此外，怀有希望的人倾向更积极地应对压力，并较少使用逃避应对策略，即如社交孤立或回避问题的方法 (Chang, 1998)。

Chang 和 DeSimone (2001) 以中介路径模型更详细研究希望倾向认知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希望感水平对抑郁徵状的严重程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进而可以提问的就是有何额外因素可以在希望感与困扰之间发挥中间作用，而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注意偏向——即偏向关注身边正面刺激或负面刺激的惯性倾向。(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 MacLeod & McLaughlin, 1995)。

注意偏向

根据 MacLeod 及其同事所提出的情绪一致性理论 (MacLeod et al., 1986; MacLeod & McLaughlin, 1995)，人们是倾向看重及优先接收与自己情绪状态一致的资讯。普遍认为无论是否达到病态程度，焦虑的人士都会选择性地关注其身边带威胁性的讯息 (Bar-Haim et al., 2007)。同样，有抑郁情绪的人经常对自己抱有高度情绪困扰的态度和信念，此举会控制了他们的讯息处理和专注力，最终可能会增加负面情绪 (Garland et al., 2010)。

有证据显示，偏向负面注意威胁和攻击的人，会有更高的犯罪风险 (Brugman et al., 2016; Domes et al., 2013)。例如，Brugman et al. (2016) 一项以69名男性在囚人士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对威胁和攻击这些负面讯息有较高关注，并较少关注如快乐面孔这正面讯息的人士，会更常使用攻击性的言语。因此，减少负面注意偏向，可能会减少心理困扰 (Browning et al., 2012)。可是，目前有关正面注意偏向的研究较少 (Lau & Waters, 2017)。基于扩展和建构模型，Wadlinger 和 Isaacowitz (2011) 提出正向情感会增加个人对正面讯息的选择性偏好，这种「保护性偏好」让人对正面讯息更敏锐，从而能够享受更好的心理健康，减少焦虑和抑郁 (Levens & Gotlib, 2010)。

在非犯罪人口之中，认知处理方式如注意力，已被证实为希望倾向与心理问题徵状，包括抑郁和焦虑之间的中介因素 (Chan et al., 2011; Yuen et al., 2014)。更高的希望感水平，与更正面的惯性关注偏向有关，进而减少心理问题徵状 (Lau & Waters, 2017)。最近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 (Yeung et al., 2015) 发现，关注正面讯息，能有利于调节希望感、主观幸福感、焦虑、抑郁，以及人际关系困难之间的关系。据我们所知，从未有研究探讨于在囚人士当中，注意偏向于希望感与心理困扰之间，是否有著潜在的中介作用。

有见及此，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倾向认知，与惯性注意力处理方式，以及心理困扰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问题如下：

(1) 香港女性在囚人士中，希望倾向与心理困扰有何关系？

(2) 注意偏向能否在以上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心理困扰」一词将代表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徵状的总和，而「希望」则代表意志力思考与目标策略路线思考的总和。我们假设，希望感水平较高的女性在囚人士会惯性地更关注正面讯息，以及较少关注周遭的负面讯息，因此而较少出现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徵状。

方法

研究通过香港惩教署的伦理审批。

研究对象及程序

参与是次研究的女性在囚人士是从罗湖惩教所招募，这里亦是收容香港大部份女性在囚人士的院所。所有参与者都是由惩教所职员转介到该院所的心理组。转介原因有多方面，比如人际冲突、情绪问题、适应问题等，她们都获邀参加这项研究。但如有不会读写、有严重干扰行为问题，和处于未稳定的精神病状态之下的女性在囚人士，将不会参与是次研究。所有参与者均以书面形式作知情同意。参与者亦会先完成心理测试，包括一些自我报告测量和社会人口特徵统计问卷。发放及收集问卷的过程由院所中的心理组职员负责，他们均是临床心理学家的助理，具备心理学知识，并接受过临床心理学家提供的培训。

量表

中文版成人希望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dult Hope Scale) (Ho et al., 2010) 评估希望倾向，当中有12题自行填写的表单，其中四个项目构成意志力次量表，而其他四个项目加起来给出目标策略路线次量表分数。其余四项为干扰元素题目。每位参与者都要根据李克特八级量表填报，评估自己在每项目中当时所属的情况（1= 绝对错误，8= 绝对正确）。意志力和目标策略路线两项各有次量表；总希望得分（希望总分：范围 1-64）是将意志力和目标策略路线两项次量表的得分相加来计算，以表明整体的希望倾向。越高得分代表越高水平的希望倾向。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中，意志力 = 0.70、目标策略路线 = 0.76，以及希望总和为 0.81。

正面/ 负面注意偏向量表 (中文版8-短版) (The Chinese 8-item short form of 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 (Chan et al., 2011) 是用于量度正负面讯息的意识倾向 (Noguchi et al., 2006)。其下两个次量表，即关注正向讯息次量表 (API)，以及关注负面讯息次量表 (ANI)，用以量度参加者对正面及负面讯息的注意力偏差。量表中每条问题均以李克特五级量表评分 (1 = 非常不切合我，5 = 非常切合我)。更高得分代表对正面或负面讯息有强烈倾向。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属良好 (API α 0.77; ANI α 0.71)。

中文版情绪自评量表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用以量度人们的心理困扰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它包括三个次量表——抑郁、焦虑及压力，各有7条问题 (Antony et al., 1998; Henry & Crawford, 2005)。参加者以李克特四级量表填报 (0 = 并不适合我，3 = 非常/经常适合我)，就过去七天情况来回答各问题自己所属的程度。情绪自评量表的总得分反映出当事人的心理困扰情况 (总分由0-42分)。该量表及各次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在本研究中均属高水平 (抑郁 α 0.88, 焦虑 α 0.85, 压力 α 0.85, 情绪自评总量表 α 0.94)。

分析计划

描述性的统计数据有助了解研究对象的概况。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皮尔森相关分析，来检视人口统计中的变数和心理测量之间的关系。SPSS PROCESS macro则用作建议模型的中介分析 (Hayes, 2013)，当中会将希望总分作为自变量，情绪自评量表总分则为因变量，正负注意力偏差作为中介。该程序最近已获推荐用作测试中介，因为它提供了比因果步骤方法更高的统计检定力 (Baron & Kenny, 1986)。

结果

样本描述

203位参与的女士，年龄介乎21—67龄，平均年龄为35.7(标准差[SD]为9.8)。她们的服刑期由1—240个月不等，平均多于54个月(实为54.34, 标准差: 45.80)。其他资料包括教育程度及罪行类别，详见表1。参与者当中的117名(即58%)曾在惩教院所服刑。有96名(47%)参与者报告在此监禁前曾接受精神科服务，其中的66名(32.5%)接受过精神科医生的正式诊断，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

表 2 是按曾否有精神科诊断来将研究参与者分组，并罗列两组各项统计分析的平均数及标准差。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显示，作为一个群体，被诊断有精神病的参与者，表现出较低的正面注意偏向 ($t(201) = 2.07, p = 0.04, \text{Cohen's } d = 0.31$) 和较高的总心理困扰水平 ($t(201) = -2.30, p = 0.02, d = 0.34$)。至于首次入狱，和多次入狱的女性在囚人士相比，在诊断上没有显著差异。

与希望倾向的相关性

表 3 显示了年龄、教育和刑期等因素，与希望感、注意偏向，和心理健康等评分范畴之相关性。从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可见，年龄与整体的希望倾向呈轻微正面关系 ($r = 0.18, p = 0.01$)。同样地，希望评分与正面 ($r = 0.19, p = 0.01$) 及负面 ($r = -0.27, p < 0.001$) 讯息注意偏差评分也呈现轻微但显著的相关性。换言之，较年长的女性在囚人士倾向有较高希望感水平，较多的正面讯息注意偏向，及较少的负面讯息注意偏向。数据显示希望倾向与所有心理学上的变数之间，出现了显著的相关性。总括而言，较高希望感水平与较少心理困扰、较少负面注意偏向，和更多正面注意偏向等都存在相关性。最后，在负面注意偏向和心理困扰之间，发现有强烈的正相关性 ($r = 0.55, p < 0.001$)；在正面注意偏向和心理困扰之间，也发现同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r = -0.47, p < 0.001$)。

表1

参与研究的香港在囚女士的社会人口特徵

	人数	%
教育程度		
幼稚园或以下	1	0.5
小学	20	9.9
中学	164	80.8
大学	11	5.4
硕士或以上	3	1.5
其他	4	2.0
就业情况		
全职	52	25.6
兼职	15	7.4
失业	66	32.5
没工作能力	3	1.5
家庭主妇或全职学生	32	15.8
退休	5	2.5
非法业务	29	14.3
使用前精神科/心理服务^a	97	47.8
使用前精神病诊断^b	66	32.5
使用前精神科药物^a	83	40.9
有定罪纪录^a	117	57.6
主要所犯罪行类型		
勒索	2	1.0
串谋诈骗	13	6.4
可公诉罪行	3	1.5
毒品有关 (如管有, 贩运)	115	56.7
欺诈, 诱导他们犯罪	7	3.4
误杀	2	1.0
骗取财物/ 服务	4	2.0
抢劫	2	1.0
性罪行	3	1.5
盗窃	28	13.8
涉未完税商品	2	1.0
使用伪造的旅行证件/文书/法定声明	3	1.5
使用他人身份证	2	1.0
暴力相关 (如伤人、殴打造成实际身体伤害)	3	1.5
其他	12	5.9

注：

人数 = 203. 参加者平均年龄为35.7岁 (标准差 = 9.8) 平均刑期为 54.3月 (标准差 = 45.8)。

a 参加者回答「是」的数目及百分比。

b 参加者回答曾接受精神科/ 心理服务的数目及百分比 (人数 =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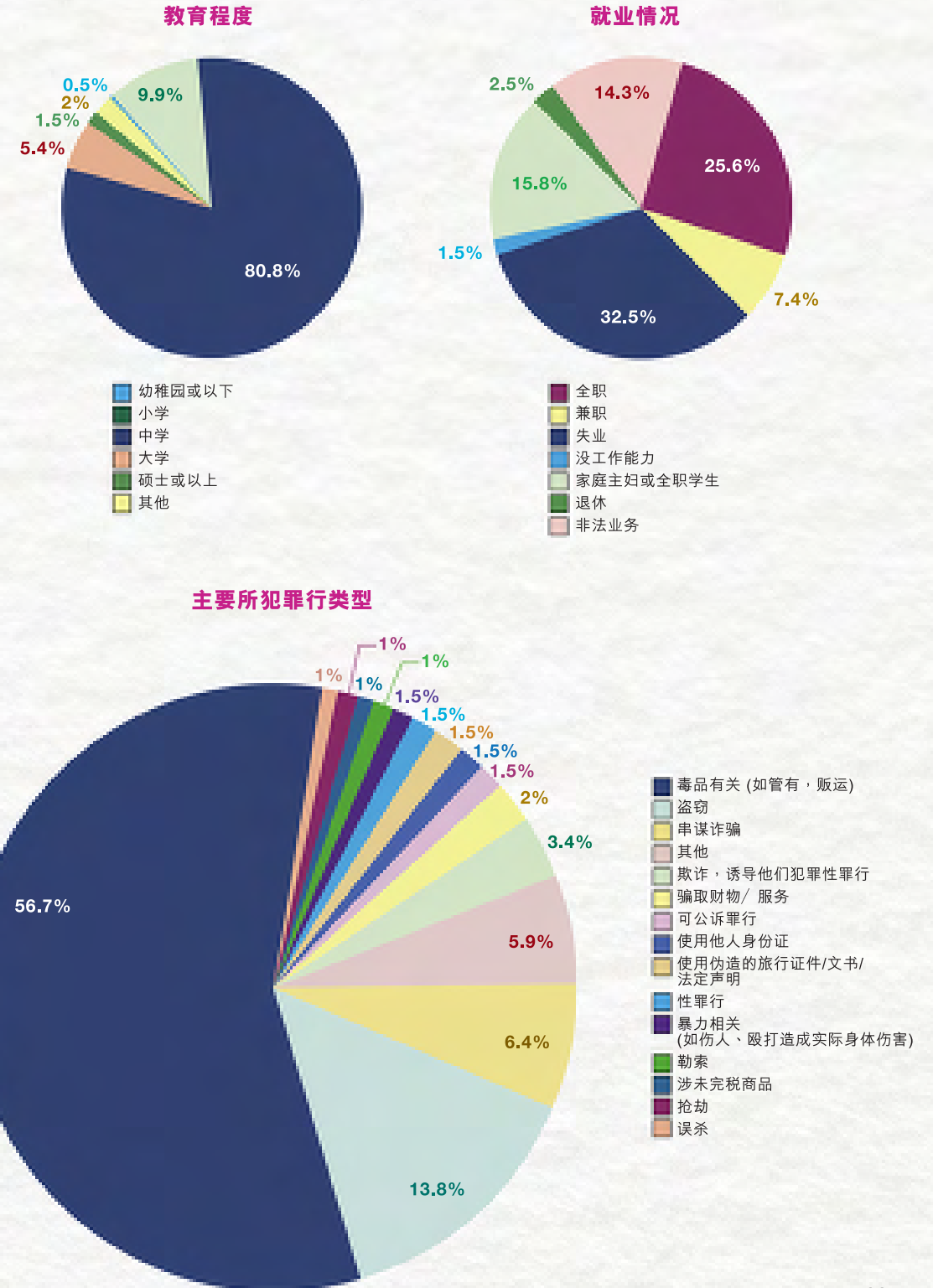


表2
量度希望、注意偏向与精神科诊断的关系

	精神科诊断 有 (人数 = 66)		没有 (人数 = 137)		t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成人希望量表 AHS					
意志力	16.12	6.62	17.28	6.99	1.12
达至目标的途径	17.65	6.69	18.69	7.37	0.97
希望总分	33.77	12.23	35.97	13.60	1.11
正及负面讯息 关注量表 APNIS					
正面注意力 偏误次量表得分	13.17	3.18	14.13	3.09	2.07*
负面注意力 偏误次量表得分	15.79	3.64	15.38	3.39	-0.78
情绪自评量表					
抑郁	17.52	11.52	14.12	10.38	-2.11*
焦虑	17.61	10.87	13.27	8.85	-3.03*
压力	21.21	10.40	19.42	10.13	-1.17
情绪自评量表总分	56.33	29.58	46.80	26.72	-2.30*

注：
希望总分 = 成人希望量表总分；API = 正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ANI = 负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DASS 总分 = 情绪自评量表总分。
缩写：成人希望量表(AHS)；正及负面讯息关注量表(APNIS)；情绪自评量表(DASS)。
*p < 0.05.

进一步分析与心理困扰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分析以心理压力为因变数，然后应用PROCESS macro (Hayes, 2013)，去测试各项变数在二元水平中如何互动。希望倾向是一个独立变数，正负面注意偏向是可能的中介因素，而年龄和精神病学诊断则是共变数。

在分析的过程中，一系列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被应用，以建立这些变数之间的零阶关系。首先，心理困扰和希望倾向之间的关系得到显著关联的证明。(β = -0.70, 95% CI [-0.99, -0.40] SE = 0.15, t = -4.62, p < 0.001)。此外，希望倾向和正面注意偏向之间的关系(β = 0.14 95% CI [0.11, 0.17], SE = 0.01, t = 10.52, p < 0.001)，以及希望倾向和负面注意偏向之间的关系(β = -0.12, 95% CI [-0.15, -0.09] SE = 0.02, t = -7.42, p < 0.001)，亦得到显著关联的证明。随后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又进一步证实心理困扰和正面注意偏向之间的显著关联(β = -1.60, 95% CI [-2.75, -0.46] SE = 0.58, t = -2.76, p = 0.01)以及心理困扰与负面注意偏向的重要关联(β = 3.01, CI [2.06, 3.96] SE = 0.48, t = 6.25, p < 0.001; 表 4)。

当正负面注意偏向，在复回归分析中作为中介因素，希望倾向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大幅下降，但关系仍然显著(前者:API: β = -0.23, 95% CI [-0.41, -0.07] SE = 0.09) / (后者: β = -0.36, 95% CI [-0.56, -0.21] SE = 0.09)。这些结果显示，注意偏向在某程度上影响了希望倾向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图 1)。



表3
香港女性在囚人士的人口特徵与各心理问题变数之间的关系

变数	1	2	3	4	5	6	7
1. 年龄	-	-	-	-	-	-	-
2. 教育	-0.27***	-	-	-	-	-	-
3. 刑期 (以月计)	-0.13	-0.17*	-	-	-	-	-
4. 成人希望量表 总评分	0.18**	-0.05	-0.06	-	-	-	-
5. 注意力量度 (正面资讯)	0.19**	-0.90	0.04	0.62***	-	-	-
6. 注意力量度 (负面资讯)	-0.27***	0.00	0.03	-0.49***	-0.27***	-	-
7. 情绪自评量表 总分	-0.07	0.08	-0.03	-0.61***	-0.47***	0.55***	-

注：
(1) 成人希望量表及情绪自评量表的次量表总分在此并不包括，只会在它们用于计算中介分析时才包括。
缩写: API = 正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ANI, = 负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DASS = 情绪自评量表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4
直接及间接影响的复回归分析测试结果

	情绪自评量表			情绪自评量中希望的中介效应		
	β	SE	95% CI	β	SE	95% CI
HS total	-0.70***	0.15	[-0.99, -0.40]	-	-	-
API	-1.60**	0.58	[-2.75, -0.46]	-0.23**	0.09	[-0.41, -0.07]
ANI	3.01***	0.48	[2.05, 3.96]	-0.36***	0.09	[-0.56, -0.21]

$R^2 = 0.50, F(5,197) = 38.74, p < 0.001$

注：
Hope Total = 成人希望量表总分;
API = 正面讯息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
ANI = 负面讯息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
DASS Total = 情绪自评量表总分数
综写: API, 正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ANI, 负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DASS = 情绪自评量表总得分
p < 0.01, *p < 0.001.



讨论

有较高希望感水平的女性在囚人士，会出现较少的抑郁徵状，这与我们起始的研究假设一致，也与过去其他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 (Elliott et al., 1991; Ho et al., 2010; Yuen et al., 2014)。这显示希望倾向认知有可能成为在囚女性处理心理困扰的一个保护因素。对女性来说，监禁的经历不单带来沉重压力和沮丧，可能更有一种不可预测未来的感觉 (Kraemer et al., 2009)。在囚女性出现自残和自杀行为往往与负面情绪状态有关，因此需要专为她们制订新策略。Van Wormer (2010)提出，艺术疗法是其中一种创新且顾及性别需要的方法，它旨在帮助和鼓励在囚女性透过自我表达方式抒发创伤，从而得著更多能力。Mak et al., (2016) 亦带来了一种开创性的方法，结合认知行为治疗和正向心理治疗，以助减低女性在囚人士的心理困扰，并提高其心理健康。他们的工作融入了加强希望认知和正向觉察的治疗，从而达到改善注意偏向的目的。此外，Riley et al. (2019) 指出，建基于静观和接纳为本的群体治疗有助提高女性在囚人士的觉察和接纳能力，并减低她们的抑郁、焦虑和由心理引起的生理疾病。

大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青少年在囚人士或女性吸毒者的治疗 (例如，Roberts-Lewis et al., 2010)；对于惩教院所内没有滥药背景的成年女性，实证为本的治疗计划也是不足够。因此，制定更多针对女性在囚人士的治疗计划定必需要。

我们的研究显示，有些女性对未来仍抱有希望的会较少出现抑郁或焦虑。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惩教院所内为在囚女性培养出希望倾向认知。在香港，被囚禁的女性人数从 1986 年的 944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3,484 人；相比之下，同期的男性在囚人士，则从 9,718 人减少到 7,998 人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6)，由此可见，在惩教院所内为女性在囚人士维持希望感等正面情绪状态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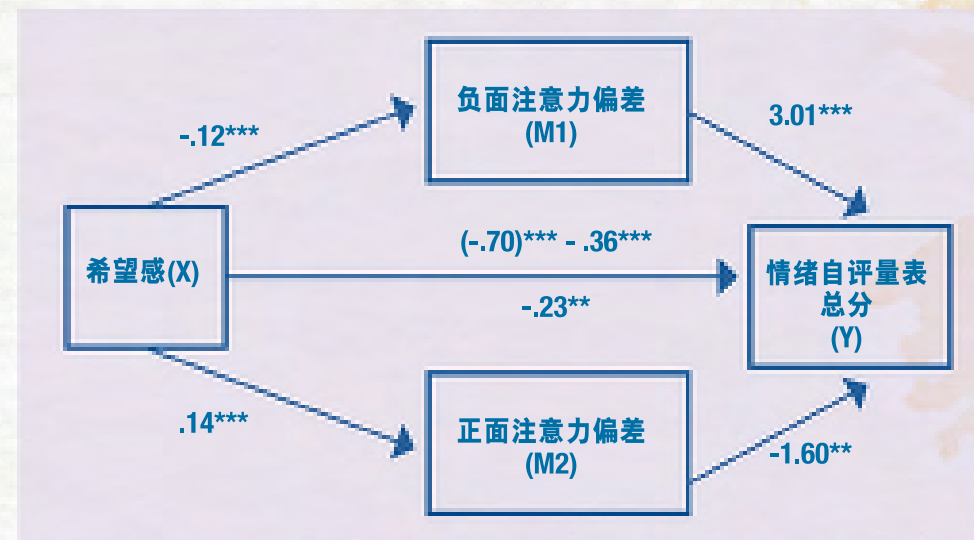


图 1 在希望总分及情况量表总分之间正负面注意力偏差的中介模型。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呈现的数值，基线系数则以在 () 内。
p < 0.01, *p < 0.001.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希望倾向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中，有一部分受正负面信息注意偏向所影响。除了已知道正负面注意偏向在希望倾向和心理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外，这次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希望倾向在预防心理困扰中的潜藏机制。换句话说，**满有希望的想法可能使注意力从负面转向正面，进而减少负面的情感状态。**较高的希望倾向标示著更目标导向的思维，鼓励追求目标。以实证为本的希望治疗在其他社群，例如面对基因结肠癌筛查的人士，已发展成熟 (Ho et al., 2012)。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理论支持去发展同类的希望治疗，以提高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感，从而减少她们的心理困扰。

此外，有证据显示，**注意偏向越负面，心理困扰就越大；相反，注意力偏向越正面，心理困扰就越低。**我们的研究看到，之前针对其他群组的研究中发现，负面情绪呈螺旋式下降，和正向情绪呈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 (Disner et al., 2011; Garland et al., 2010; Kellough et al., 2008)。对于接收一些情感的资讯，若出现偏向的认知过程，负面情绪便不住延续和出现恶性循环，反之亦然。通过例如扩阔注意力和正面重估等认知过程，有可能打破这种局面，得以在减压的同时，亦触发正面情绪的良性循环。因此，除了针对增加希望倾向的治疗外，其他能减少负面注意偏向，和增加正面注意偏向的治疗，都可能对女性在囚人士有所裨益 (Bar-Haim, 2010)，**所以女性惩教院所的临床心理学家可考虑安排希望治疗，以及改善注意力偏差的培训。**

尽管其他样本的特徵分析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但识别人口统计的风险因素可能有助临床心理学家筛选心理困扰风险较高的在囚人士，并制定适当的治疗措施。简而言之，在是次研究的女性在囚人士样本中，发现了一些人口统计和犯罪因素，与心理困扰有关。年龄和希望倾向，以及注意偏误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青少年在囚人士还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力来应对和适应惩教院所中被囚的感觉和相关经历。一项针对南非年轻女性的研究指出，希望感也与学校成绩、酒精使用和家庭支持等变数有显著关系 (Abler et al., 201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佳学业成绩、较少饮酒和更多家庭支持的年轻女性，会有较高的希望感水平。虽然这些发现未足以推说到在囚人士身上，但这阐明了考虑其他变数的重要性。在筛查阶段中，为女性在囚人士识别更多风险和保护因素，及早识别那些希望感较低的人士，然后进行相关治疗，甚或可能会挽救生命，值得考虑推行。



局限性

我们的研究有一些局限性，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横向研究，所以虽然我们可以从统计分析中推断出路径，但我们不能看到其中的原因及影响。然而，现在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值得通过纵向和干预研究去进一步测试的模型。注意偏向作为调节变数的可能性，值得被更充分的探讨。其次，我们只调查已判刑的女性在囚人士，因此对于在狱中候审的女性、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未入狱的女性，以及所有男性在囚人士，他们的希望倾向、注意偏向和精神健康之间的任何关系，仍然未能确定。此模型似乎很可能适用于这些群组，因为它适用于长期有压力但完全不同的群体，例如患癌病人，但需要更多针对具体情况的研究。第三，我们的样本仅包括被转介接受心理服务的女性，研究对象会可能偏向于困扰和负面注意偏向。若将来我们以具完整代表性的样本去作研究，便可以更了解她们的精神状态。

临床意义

希望治疗可以提供目标设定、寻找方法和采取步骤的技巧，以实现目标同时亦训练保持动力和注意力，以提高对环境正面因素的觉察，帮助女性在囚人士管理她们负面的想法以及面临挑战和困难时的担忧。此举，可一定程度地减少焦虑和抑郁，从而提高这个弱势群体在惩教院所中的精神健康。

参考资料

- Antony, M. M., Bieling, P. J., Cox, B. J., Enns, M. W., & Swinson, R. P. (1998).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42-item and 21-item versions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in clinical groups and a community samp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0*(2), 176. <https://doi.org/10.1037/1040-3590.10.2.176>
- Bar-Haim, Y., Lamy, D., Pergamin, L.,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07). Threat-related attentional bias in anxious and nonanxious individuals: A meta-analytic stud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1), 1.
- Bar-Haim, Y. (2010). Research review: Attention bias modification (ABM): A novel treat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1*(8), 859–870.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10.02251.x>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1.6.1173>
- Bloom, B., Owen, B., & Covington, S. (2003). *Gender-responsive strategies: Research practice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women offend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 Browning, M., Holmes, E. A., Charles, M., Cowen, P. J., & Harmer, C. J. (2012). Using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as a cognitive vaccine against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72*(7), 572–579.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12.04.014>
- Brugman, S., Lobbestael, J., von Borries, A. K., Bulten, B. E., Cima, M., Schuhmann, T., ... Arntz, A. (2016).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violent incidents in forensic psychiatric inpatients. *Psychiatry Research, 237*, 229–237.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6.01.035>
- Chan, M. W. C., Ho, S. M. Y., Tedeschi, R. G., & Leung, C. W. L. (2011). The valence of attentional bias and cancer-related rumin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Psycho-Oncology, 20*(5), 544–552. <https://doi.org/10.1002/pon.1761>
- Chang, E. C. (1998).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appraisal of a stressor: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influences and relations to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4), 110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4.4.1109>
- Chang, E. C., & DeSimone, S. L. (2001). The influence of hope on appraisals, coping, and dysphoria: A test of hope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2), 117–129. <https://doi.org/10.1521/jscp.20.2.117.22262>
- Disner, S. G., Beevers, C. G., Haigh, E. A., & Beck, A. T. (2011).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2*(8), 467–477. <https://doi.org/10.1038/nrn3027>
- Domes, G., Mense, J., Vohs, K., & Habermeyer, E. (2013). Offenders wit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show attentional bias for violence-related stimuli. *Psychiatry Research, 209*(1), 78–84.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2.11.005>
- Elisha, E., Idisis, Y., & Ronel, N. (2012). Window of opportunity: Social acceptance and life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imprisoned sex offende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 323–332.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2.03.004>
- Elliott, T. R., Witty, T. E., Herrick, S., & Hoffman, J. T. (1991). Negotiating reality after physical loss: Hope, depression and dis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4):608–61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1.4.608>
- Garland, E. L., Fredrickson, B., Kring, A. M., Johnson, D. P., Meyer, P. S., & Penn, D. L. (2010). Upward spirals of positive emotions counter downward spirals of negativity: Insights from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on the treatment of emotion dysfunctions and deficits in psychopat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7), 849–864.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0.03.002>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and London: Guilford Press.
- Henry, J. D., & Crawford, J. R. (2005). The short-form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Construct validity and normative data in a large non-clinical sampl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4*(2), 227–239. <https://doi.org/10.1348/014466505X29657>
- Ho, S. M. Y., Ho, J. W., Bonanno, G. A., Chu, A. T., & Chan, E. M. (2010). Hopefulness predicts resilience after hereditary colorectal cancer genetic testing: A prospective outcome trajectories study. *BMC Cancer, 10*(1), 279. <https://doi.org/10.1186/1471-2407-10-279>
- Ho, S. M. Y., Ho, J. W. C., Pau, B. K.-y., Hui, B. P.-h., Wong, R. S.-m., & Chu, A. T.-w. (2012). Hope-based intervention for individuals susceptible to colorectal cancer: A pilot study. *Familial Cancer, 11*, 545–551. <https://doi.org/10.1007/s10689-012-9545-3>
-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6).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panels/hs/papers/hs20170425cb2-1220-1-e.pdf>
- James, D. J., & Glaze, L. E. (2006).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Kellough, J. L., Beevers, C. G., Ellis, A. J., & Wells, T. T. (2008). Time cours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in clinically depressed young adults: An eye tracking stud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6*(11), 1238–1243.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08.07.004>
- Kraemer, S., Gately, N., & Kessell, J. (2009). *HoPE (Health of Prisoner Evaluation): pilot study of prisoner physic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ondalup, Australia: School of Law & Justice, Edith Cowan University.
- Lau, J. Y. F., & Waters, A. M. (2017). Annual Research Review: An expanded account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risk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8*(4), 387–407. <https://doi.org/10.1111/jcpp.12653>
- LeClair, D. (1990). *The incarcerated female offender: Victim or villain*. Research Division, Massachusetts Division of Correction (October).
- Levens, S. M., & Gotlib, I. H. (2010). Upd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imuli in working memory in depres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9*(4), 654–664. <https://doi.org/10.1037/a0020283>
- Levenson, J. S., & Willis, G. M. (2019). Implementing trauma-informed care in correctional treatment and supervision.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8*(4), 481–501.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18.1531959>

Lovibond, P. F., & Lovibond, S. H. (1995).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3), 335–343.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00075-U](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00075-U)

MacLeod, C., Mathews, A., & Tata, P. (1986). Attentional bias in emotion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5(1), 15.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95.1.15>

MacLeod, C., & McLaughlin, K. (1995).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 bias in anxiety: A conceptual replic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1), 1–14.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E0004-3](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E0004-3)

Mak, V. W. M., Ho, S. M. Y., Kwong, R. W. Y., & Li, W. L. (2016). A gender-responsive treatment facility in correction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2(4):1062–1079.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6667572>

Martin, K., & Stermac, L. (2010). Measuring h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4(5), 693–70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09336131>

Mcdermott, K. (1991). Suicide and self-injury in prison: A literature review by Charles Ilo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1(2), 201–202

Miller, N. A., & Najavits, L. M. (2012). Creating trauma-informed correctional care: A balance of goals and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3(1), 17246. <https://doi.org/10.3402/ejpt.v3i0.17246>

Moulden, H. M., & Marshall, W. L. (2005). Hope in the treat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hope theory.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11(3), 329–342.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0512331316361>

Noguchi, K., Gohm, C. L., & Dalsky, D. J. (2006). Cognitive tendencies of focusing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0(6), 891–910. <https://doi.org/10.1016/j.jrp.2005.09.008>

Riley, B. J., Smith, D., & Baigent, M. F. (2019). 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based group therapy: An uncontrolled pragmatic pre-post pilot study in a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of female priso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3(15–16), 2572–258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9858487>

Roberts-Lewis, A. C., Welch-Brewer, C. L., Jackson, M. S., Pharr, O. M., & Parker, S. (2010). Female juvenile offenders with HEART: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an intervention model for female juvenile offenders with substance use problem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40(3), 611–625. <https://doi.org/10.1177/002204261004000304>

Sykes, G. (1958). *The society of cap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C. R. (2002).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3(4):249–2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304_01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 Holleran, S. A., Irving, L. M., Sigmon, S. T., ... Harney, P. (1991). 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asure of ho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4):570–58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0.4.570>

VanWormer, K. (2010). *Working with female offenders*. 1. Aufl. (ed.). Hoboken, NJ: Wiley Web.

Wadlinger, H. A., & Isaacowitz, D. M. (2011). Fixing our focus: Training attention to regulate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5(1), 75–102.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0365565>

Yeung, D. Y., HO, S. M. Y., & Mak, C. W. Y. (2015). Brief report: Attention to positive informa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pe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42, 98–102.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5.04.004>

Yuen, A. N. Y., Ho, S. M. Y., & Chan, C. K. Y. (2014).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ancer-related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hope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among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Psycho-Oncology*, 23(4), 412–419. <https://doi.org/10.1002/pon.3433>

Zamble, E., & Porporino, F. (1988). *Coping, behavior, and adaptation in prison inmates*. New York, NY: Springer-Verlag.